

（二〇一九年四月八日出版）

本期目录

| | | |
|--------|-------------------------|-----|
| 【史海钩沉】 | 北师大的“12月黑风”与“修建科劳改队”（上） | 赵惠中 |
| 【往事非烟】 | 北大文革回忆——7·12大字报 | 吴乃龙 |
| 【乱世人生】 | 我跟“反革命”父亲“划清政治界限” | 冯印谱 |
| 【亲历者言】 | 山雨欲来风满楼 | 叶桂桐 |

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浏览，网址为：<http://museums.cnd.org/CR>。

【史海钩沉】

北师大的“12月黑风”与“修建科劳改队”（上）

· 赵惠中 ·

所谓“12月黑风”，指的是1966年12月发生在北京以给林彪提意见为主要内容的事件。但从现在看到的资料中显示，此事件可以1966年11月15日北京农业大学附中伊林（刘握忠）、涤西（张立才）的大字报《致林彪同志的一封公开信》作为起点，到1966年12月中下旬这批年仅二十岁左右的热血青年全体被抓进牢房为终点，时间跨11月与12月两个月份，长度达一个多月之久。但为了叙述方便，本文仍沿用原来的称呼“12月黑风”。从内容来看，事件所及不仅限于林彪一个人，还包括了“中央文革”几名大人物，也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等新思潮，所谓“黑风”其实不黑。

一、背景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这是代表最高司令部向全国各界发出的动员令。

6月1日晚8点的例行全国新闻联播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播放了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宋硕、陆平、彭珏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什么？》“文革”发动者后来称赞它是“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

6月2日《人民日报》第一版以醒目标题《北京大学七同志一张大字报揭穿了一个大阴谋》，全文刊登了聂元梓领衔署名的的大字报，并发表了评论员的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当日，《人民日报》还同时发表社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这些接二连三的举动，吹响了将“文革”推向全国的进军号。几天之内，全国的大、中、小学都停课搞“文革”，在北京几乎所有的高校党委都被打成黑帮，无一幸免。昔日的校领导都成了走资派，教授都是资产阶级学术权威，较优秀的老师有的也被打倒，大多数是诚惶诚恐，普通教师也是人人自危。开批斗会搞“喷气式”，戴高帽子游街、罚跪认罪等悉数尽有。此时的刘少奇

立即向各学校派工作组，试图让工作组控制局面，将运动纳入有序的轨道。但工作组的做法明显与最高当局掌控的《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等宣传口径不一致。如北师大工作组提出“层层剥笋”“抓游鱼”的口号等，模糊了运动的重点，敏感的学生就贴工作组的大字报，工作组根据刘少奇的指示把这部分学生打成反革命，进行镇压。刘少奇搞的这一套实际上是1957年反右的延伸，这一招立即被毛泽东揪住不放，说刘少奇推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镇压学生群众运动。由此导致了刘少奇先受贬后倒台终丧命。1966年8月5日，我校女附中的副校长卞仲耘被活活打死，8月17日，政教系石磐教授在主楼七楼跳楼自杀身亡。社会上大搞破“四旧”，打、砸、抢、抄家成风，“黑五类分子”及其家属倍受打压，整个社会一片混乱。

在1966年8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的林彪取代了刘少奇，从原来的第六位跃升到了第二位，成了中共唯一的副主席。从此以后，林彪成了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全中国各种场合都必须在“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后再加上一句：“敬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在组织机构方面，以“中央文革”取代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与部分政府机构，彻底打乱了原来正常运转的权力机器。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就在这一天，毛泽东接受了师大女附中学生宋彬彬献的红卫兵袖章，还对宋彬彬说不要文质彬彬，“要武嘛”。“要武嘛”的“最高暗示”，激发了全国第一轮武斗和抄家狂潮，史称“红八月”。这场有组织的暴行，得到了高层及公安部门的支持和纵容，很多地方的派出所向红卫兵提供了管区内“牛鬼蛇神”的名单和地址。谢富治在“红八月”中的一次公安干部会议上，对武斗作了诠释：“红卫兵打了坏人不能说不，在气愤之下打死他就算了。如果说不对就给坏人撑了腰，坏人嘛打死了就算了嘛。”据不完全统计，8月至9月的40天里，红卫兵仅在北京一地就打死了1772人，我校中文系刘盼遂教授及其夫人梁秋色等多人就是在此期间被迫害致死的。这股狂潮从北京迅速蔓延至全国。

9月18日，林彪接见高等军事学院、政治学院和总政宣传部负责人时说：“对毛泽东思想抱什么态度是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就是要抓住对毛主席的态度，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问题。”“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太多，读不完，他们离我们又太远。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中，我们要99%的学习毛泽东著作。”“毛主席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高得多，现在世界上没有哪个比得上毛主席的水平，有人说《资本论》是理论的基础阵地，其实《资本论》只能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规律问题。我们国家资本主义已经打倒了，现在是社会主义规律问题。”“毛主席这样的天才，全世界几百年，全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

不久，在接见到首都串联的全国军事院校学员时，叶剑英在讲话中还说：经医生检测和科学论证，表明伟大领袖毛主席可以活到150岁以上，敬爱的林副统帅也可以活到120岁以上，他们能够带领我们进入……社会。

这一讲话内容被红卫兵们以“北京来电”的方式迅速传遍大江南北。

以林彪讲话为标志，在众多党政头面人物的实际行动带领下，国人将对“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的个人崇拜和迷信推到了狂热的极点。

在众人狂热的浪潮中，还是有不少人保持了清醒的头脑，他们并不盲从，他们在思索：这种现状正常吗？哪里出了问题？我们该怎么办？首先打破这“一边倒”狂热的是北京农业大学附中的两位高三学生刘握忠（伊林）和张立才（淅西）。他们于1966年11月15

日上午七点左右，在清华大学贴出了一份《致林彪同志的一封公开信》的大字报。（见本刊 z k 9 9 0 3 d）

在这大字报中，伊林、涤西对上述林彪讲话中的四条进行批驳。对于第四条“中国几千年，世界几百年才出现一个像毛主席这样的天才”，原来有一段进行批驳的评论文字，后来被涤西删掉了。他认为这条太尖锐，因为直接触犯到毛泽东了，而且又不好驳。那文章里面已经涉及毛的权威了，包括毛主席对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贡献等，都给推翻了，已经是不得了的事情了。再往下去论毛泽东个人的事，这个问题确实不好去碰。这是涤西最担心的。但是，这实际上又是一个大的问题，所以留下题目没内容，这叫立而不论。就留给他老人家自己去猜，去论吧。

这封公开信十一月十五日清晨七点左右用大字报形式公布于清华大学，当日下午就被部分同学撕毁，并被骂成“毒草”“反革命”，还扬言“要批倒、批臭”，等。后来又贴到北京大学。大字报被撕掉后，涤西感到事态严重了。他就一不做二不休，组织人印传单。并且还写了《公开信》后边的那段文字，还加了两个后缀。现在一般看到的是传单上的文章，这最后部分的文字是原来的大字报上没有的。后来在社会上引起震动的也是这张传单。一张蜡纸一般也就能印八百份到一千份，他亲自推油碾子，不让别人动，推得非常仔细、小心，生怕这蜡纸破了。他那派的红卫兵是同意他们的观点的，他们实际上是一个团队。传单用的是十六开的纸，共四页，其他人负责叠页子，装订。涤西拼命地印，印了一千二百份，直到那张蜡纸已经不能再印了为止。

传单印好后，大家轰地跑出去，分别到各大专院校、各军队和机关大院的门口，一路走一路贴，满北京散发传单。传单的影响实际上比大字报大多了，贴出去后，立即引起社会震动。“中央文革”、江青要去看的是传单。他们在大字报上落款写了农大附中伊林、涤西，也直接签上了刘握忠、张立才的大名。而传单的落款只写了农大附中伊林、涤西，因此知道他们真名的人并不多。

11月30日，北京林学院李洪山又在“红卫战斗兵团”负责人赵全来的协助下，贴出一条“踢开中央文革小组自己起来闹革命”的巨幅标语。

12月1日上午9时，在北京串联的福建师范学院、浙江绍兴一中、黑龙江双城县杏山中学、黑龙江省佳木斯手工（业）中等学校的学生和林院林业系捍批队的师生、林院部分工人与北京林学院红卫兵李洪山进行了一次辩论会。

学生们问李洪山为什么提出“踢开中央文革小组，自己闹革命”这一口号。

李洪山说他的理由有三：

1.根据十六条中的第九条，“中央文革小组”只能是起桥梁作用的。不管是哪一级的“文革”小组都是经过群众全面选举的，像巴黎公社那样。十六条中，并没有讲“中央文革小组”可以不经过群众选举。“中央文革小组”没经选举产生，不符合十六条精神。因此，必须踢开。要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

2.“文革”小组成员坐在上面，做官当老爷，不深入下面，不调查，都是蹲在北京，不到外地。“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就是钦差大臣满天飞，夸夸其谈，乱发议论。副统帅林彪同志讲，要好好听听最高统帅的话。中国只有毛主席才能领导。任何事物都要怀疑，怀疑一切。周总理、江青、陈伯达等的讲话都要用最高指示去分析。什么东西都要怀疑。现在北大

聂元梓搞得四分五裂，有“新北大”红卫兵、北大红卫兵、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井冈山战斗队，等等。这就是“中央文革小组”造成的，是谁我就不说了。总之，扼杀了群众的首创精神和智慧。

3.“中央文革”制造分裂。10月6日三司会议上，江青说：“要坚持原则，讲究策略，要用阶级观点分析多数派、少数派。”这是分裂的开始。陈伯达讲话要冲垮修正主义红卫兵，传单满天飞。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全国哪有那么多的修正主义红卫兵？“现在是大民主，所以才写这幅革命的标语。有什么不合法的？！法律上也没有规定说不准拉横幅大标语，我们有自由言论的权力。要在前三年，我写了就不在这里呆了。我写的都是革命的大字报、革命的标语。即使是右派，也要放在运动后期酌情处理呢。”

伊林、涤西的大字报与李洪山的巨幅标语虽然遭到了迎头痛击，但也获得了许多学校少部分同学的支持，给林彪与“中央文革”提意见的大字报纷纷出现，北师大便是其中之一。

二、北师大的“12月黑风”

12月9日，中一（2）班的敦进田（林锋）、张传亭（向东彪）贴了一份题目是《也致林彪同志一封公开信》的大字报。

中文系学生彭加瑾、王永敬在12月10日与12月12日，分别贴出了《我们也贴“中央文革小组”一张大字报》和《把无产阶级的大民主推向新阶段》两份大字报。

12月11日，物三（3）的刘中柱、杨以鸿贴了《林副主席也是可以批评的——给林副主席的一封公开信》，物三（4）的李文博立即在此大字报上用钢笔签上了表示支持的评语。

12月13日，物三（3）的刘琢、李鸿杰、金宝英贴出了《“中央文革”要把运动引向何方》的大字报。

12月15日，数二（1）班李世取（黑牛）张贴了《必须彻底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的大字报。后来他又接着贴了《致“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公开信——几点意见和建议》和《一个“反革命”分子的话》的大字报。

因为不知道彭加瑾、王永敬、刘琢、李鸿杰、金宝英现在何处，也不清楚后来为什么对他们几个人没有被重点打压，所以我写此文时没与他们五人联系。下面重点就谈刘中柱、杨以鸿、敦进田、张传亭、李文博、李世取六人。

刘中柱和杨以鸿一开始就怀疑“文化大革命”。他们都不迷信权威，都希望生活在民主和科学的氛围中。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发表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那时他们班正在北京教学仪器厂劳动实习。当读到这篇文章时，他们顿生疑窦，这样的文章是科学的吗？恰好他们班孙光启同学的舅舅李大可是中国戏剧研究院的研究人员。孙光启和他们一样怀疑这篇文章。由孙光启联系，他们三人拜访了李大可先生。可能由于戏剧研究院已经决定了方针政策，李大可先生表示理解和支持姚文元文章。刘中柱和杨以鸿与李先生辩论了近三个小时，互相说服不了对方。1966年2月10日，中文系四年级学生金宏达（时汉人）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对批评《海瑞罢官》的几点异议”的文章。

1966年12月，为躲开学校的嘈杂，刘中柱、杨以鸿、孙光启和李观韶四人到北京教学仪器厂，边劳动边休息。当时刘中柱和杨以鸿对“文化大革命”已持否定态度，但没有表达的机会。伊林和涤西的《公开信》给了他们机会。当时杨以鸿的观点认为，毛主席作为绝对权威已是不可接受的，现在又加一个不能动的权威——林副统帅，更是不可接受的。如果接受毛主席作为绝对权威是迫不得已的，决不能再来一个绝对权威。刘中柱的看法较为实际。中国一定要有民主，民主就有不同意见，不同的意见不等于反对。如果中国没有民主和科学，将不可能得到发展。“文化大革命”将不同意见视作反对，进而视作反革命，这是不可接受的。一定要在这个问题上较量一下。本质上他们的大字报是反对“文化大革命”。目标是事件——“文化大革命”，至于大字报的对象具体是哪个人，并不重要。那时候对林彪个人，并无特别恶感，只不过认为，他的一些讲话，不像话，不像我们这么大的一个国家的领袖而已。

刘中柱、杨以鸿、孙光启和李观韶四人在北京教学仪器厂工人宿舍讨论。他们在大字报中强调：无论是从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的角度来分析，事物总是要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当然也是要不断发展的。把毛泽东思想誉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岂不是要窒息毛泽东思想，使其不再有所发展？大字报由刘中柱起草、杨以鸿誊写、李观韶检查。当时已考虑到风险，所以只有刘中柱和杨以鸿署名。李观韶不署名，万一出事后李观韶留在外面可作些照应的工作。大字报底稿由李观韶保存。此大字报是在北京教学仪器厂写好后，由刘中柱、杨以鸿、李观韶三人一起带回学校贴出的，贴了后又返回工厂。

12月17日凌晨三时，谭厚兰就派手下人把他们两人从工厂揪回学校的小红楼看管起来，同时被看管的还有张传亭和敦进田。当晚就在北饭厅召开了批斗刘中柱、杨以鸿、张传亭、敦进田四人的全校大会。12月18日，外语系的董连猛又把他们四人在外语系批斗了一次，随后就把他们四人押送专政机构了。李观韶后来参加了井冈山造反兵团。

敦进田、张传亭写的公开信是一份油印小字报，贴在大字报栏里。内容可分两大部分，前半部分以较大的篇幅为林彪歌功颂德，很怕落下反林罪名；后半部分以较小篇幅说明：即便伊林、涤西的观点有错，也不应该把这两位农大附中的学生打成反革命。对他们的大字报暂不评论，仅从他们的笔名来看，“林锋”就是从林杰、关锋的姓名中各取一个字组成，“向东彪”即向着毛泽东与林彪，其意义不言自明。但是，马上就有人在他们的笔名上大做文章，说“林锋”“向东彪”的含意就是像树（林）的（锋）芒指（向）毛泽（东）和林（彪），其狼子野心何其毒也。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李世取，重庆市人，平民“红五类”家庭出身，父亲是工人。当时为数学系二（1）班学生，平时用功于专业学习，时间抓得非常紧，业余喜好看些小说，间或也看点历史、政论之类的闲书。

1966年10月底，他与其班上十多名同学响应“中央文革”等关于学生串联可用“步行”方式，以更好地接触工农大众的号召，组织“长征队”，计划由北京步行到延安，途经“平型关”“大寨”，沿途接受革命传统教育。11月中旬，“长征队”抵达太原小住之际，正逢中央下达要求学生们返校“复课闹革命”的紧急通知，他与陈木法就迫不及待地脱离大队，乘拥挤不堪的火车连夜返回了北京，其他同学则不顾中央的通知，照原定计划继续步行串联，最终抵达革命圣地延安，1967年元旦后方返回北京。

返回北京后，他与陈木法往西单、王府井等旧书店买回了不少数学专业书籍，为“复课”做了些扎实的准备。但当时像他们那样响应中央号召及时返校的学生并不多，整个校园

还是冷冷清清的，课肯定一时半会也复不起来。于是，他俩自我规定：半天自学专业知识，半天关心“文化大革命”。

从李世取后来的“交待”材料中看到：回校的半个多月，他回顾了“文革”开展近半年来的历程及“长征”途中的所见所闻，感到“文革”存在许多问题，如“打击面”过大，各地“乱批乱斗”现象严重，“要文斗，不要武斗”的规定不能落实，被批判者的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人格遭受严重践踏，更为严重的是工农业生产全面受损，对刚刚经历“三年困难时期”而1964年、1965年才真正复苏、好转的国民经济发展非常不利，且因在河北易县（狼牙山五壮士英勇抗击日寇之地）和山西沿途（包括平型关地区）都见到老百姓的生活仍很困苦（连基本口粮都非常少），教育都还非常落后，要搞“资本主义复辟”是连基础都没有的；觉得国家本应该将主要精力用于发展经济、教育，更担忧照当时“文革”的趋势发展，搞不好很可能让全国百姓再经历一次“困难时期”。

于是，回北京“半天关心文革”的十多天里，经过反复考虑，他首先给时任“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顾问康（生）老写了一封信（通过邮局寄出），信的署名是真名。据说他当时并不想出风头，只是希望“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领导们多了解一些社会实际情况，以做出正确的决策。信的主要内容是反映了步行串联中沿途的观感，表述了自己的忧虑，就关于如何“更健康”地开展“文革”提出了自己个人的“几点建议”，核心内容是希望在“文革”中“中央文革”能够引导群众“历史地、全面地评价干部”，要“加强领导”，要“加强政策引导和落实”“对乱斗人、乱打人的”无政府、无法纪现象一定要制止，对工农业生产一定不能放松，而学校、学生长期停课带来的长远损失也许是无法弥补的，也应重视。

12月初，北师大已有学生张贴出给林副统帅和“中央文革”提意见和建议的大字报后，他首先张贴了一张谈自己对“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的认识的大字报——《必须彻底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署名“黑牛”。大字报强调：既然我们要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那么，在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前提下，对国家领导人的善意意见和提醒都是合法的，都是值得肯定的，因而不能打击、迫害给林副统帅提意见的人。依据大字报内容来看，这些给“中央文革”提意见和建议的人更是完全出自对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关心，对他们更不能打击、迫害。

接着，黑牛将其给“康老”所写信的内容转抄成两张大字报公开张贴，题目是《致“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公开信——几点意见和建议》，署名也是“黑牛”。

黑牛的大字报张贴出来后，一直没有受到批判，反倒有若干人在大字报的空白处写下支持的意见。

12月17日清晨，林锋、向东彪和杨以鸿、刘中柱被谭厚兰抓起来的消息在北师大校园内传开，在他们张贴的大字报旁新张贴出一些标语和大字报，其中多为口号“打倒反对林副统帅的现行反革命林锋、向东彪、杨以鸿、刘中柱！”“攻击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敬爱的林副统帅罪该万死！”“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等，同时还新贴有大字报和标语，称“坚决支持、拥护‘中央文革’的正确领导”“谁反对‘中央文革’就打倒谁！”正告：“反对‘中央文革’者绝无好下场！”要“誓死保卫‘中央文革’！”“誓死保卫‘文化大革命’的旗手江青！”“誓死保卫‘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

校园内的空气一时格外凝重。

这一天，原给“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张贴过大字报的学生中有立即表态转变立场的，也有“反戈一击”，立即揭发杨以鸿还有其他“反动言论”，等等。而唯独不见黑牛有新动静！在同学们都以为黑牛会就此收手并立即做出“检查”的时候，他的表现却让人大跌眼镜：

18日下午，在纷纷扬扬的大雪中，沉默寡言了一天多的黑牛反倒张贴出一张题为《一个“反革命”分子的话》的大字报。大字报首先为林锋、向东彪和杨以鸿、刘中柱等辩白，（大意）称这些同学都是“文革”初期的热心参与者（其中的林锋、向东彪曾为“红卫兵”），他们大字报的内容并无对林副统帅的恶意攻击，而对林副统帅讲话中的“顶峰论”“天才论”有不同看法是很正常的，他们公开提出自己的不同看法，表现的是勇于探索真理的赤子之心，不能说有罪。又说，“文革”已经到了一个关键时期，对已经开展的“文革”做总结，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建议是真正关心“文革”的人应尽的责任，等等。记得该大字报的结尾大意是：我自知张贴出这张大字报的后果，我知道前面等待我的是什么，但是真理和真相也在召唤我……别了，我的家人，我的父母！别了，这段时间与我在一起踢球的小伙伴们！别了，生我养我的劳动人民！

大字报贴出不久即引来围观！

据说，黑牛在张贴完大字报后即往理发店先理发，再往澡堂洗澡，吃了晚饭后回到宿舍收拾好换洗的衣物和《毛选》等书籍，不到九点即安然入睡。

后来听说，黑牛吃过晚饭回到宿舍时，一位素不相识的教育系同学曾急匆匆地敲开他的房门，劝告他说：黑牛，我佩服你的勇气，但是我希望你马上去将自己的大字报撤下来，并立即做出检讨。在目前这种形势下你的努力是没有用的……但黑牛没有听取这位同学的劝告。

黑牛被拘捕那天的凌晨，在同班同学的带领下，学校治保会的工作人员来到黑牛的宿舍，门开灯亮，黑牛醒来，睁开双眼看清来人后的第一句话是：（你们）“是来带我走的吧？”得到肯定答复后，黑牛从容穿好衣服，抱起放在床头的衣物、背上书包，在治保会人员和同学的“护送”下来到治保会，那里有公安局的同志正等着他……

据说，他在书写完最后一张大字报后还给自己的父母和哥哥写了信，信中感谢了父母的养育之恩，请父母原谅他的不孝，并请哥哥代自己尽孝。

李世取当时的表现有些让人觉得不可理喻！

后来批判他时，多次问他：其“黑牛”的化名是不是“黑帮、牛鬼蛇神”的缩写，你是不是要代表“黑帮牛鬼蛇神”出来说话？他的回答是：自己的乳名就是黑牛，且他长在南方的农村，从小知道南方的水牛（皮毛都是黑色的——黑牛）是很能吃苦耐劳而又是有大脾气的，这点很像自己，因而写大字报都用黑牛为笔名。

林锋、向东彪、刘中柱、杨以鸿四人在写大字报之前都将自己的观点做过宣传，与人讨论过，因而他们“东窗事发”后连带一些同学也要做“深刻检查”，搞得十分紧张。唯有这位黑牛独往独来，写出那几张大字报之前，不与同班的任何一位在校同学商量、交流，特别回避与陈木法接触，后来“交代”说都是自己一个人躲在阴冷无人的大教室里写的，所以也没有哪一位同学因他的大字报受牵连。特别该强调的是，陈木法没有受到黑牛的任何牵连，后来思想上远离“文革”运动，坚持偷偷自学，且借用黑牛买回的旧书，提前自学了研究生

的有关基础课程，1978年考取了硕士研究生并提前毕业，后被送美国深造，学成归国报效祖国，2000年后成为我国的科学院院士。

李文博是物理系三（4）班的学生，虽然他在“12月黑风”中没有直接贴林彪与“中央文革”的大字报，只是在贴林彪的大字报上留言表示支持，但他是被抓进拘留所六人中的重犯。他是12月19日被押送进拘留所的，因其罪行“重”，关押的“号子”都与另五人不同。李文博的罪“重”在何处呢？早在1966年10月17日李文博贴出了《公社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了》的大字报（见本文后附件），此大字报当时在北师大反响不是最大，只是说他鼓吹无政府主义。但因他在大字报中鼓吹一种大民主、国家体制改革的新思潮，在校外影响极大。伊林、涤西他们把他与北京大学的乔兼武（在1966年8月26日写了《造三个大反——用毛泽东思想改造旧世界，创建新世界》的大字报）并列称为“新思潮”的“祖师爷”，说他们起草那封《公开信》，关键的是受到北京师范大学的李文博和北京大学的乔兼武的影响。由此可见，北师大还是此“黑风”的源头之一。

对他们六位当事人，面临的是“无产阶级专政”。其实对北师大富有正义感的群众来说，也是一片白色恐怖。王福亮，1966年底是学校播音员，是敦进田、张传亨的同班同学。他播音时，心里想着敦进田、张传亨怎么会成反革命了？一走神，本是要喊“打倒林锋、向东彪！”的，结果却喊成了“打倒林彪！”幸好他出身好，才躲过一劫。物二（3）的杨怀志看到了伊林、涤西和刘中柱、杨以鸿的大字报，就在大字报边上参与了对这些大字报的议论，与不少在校同学一样，也认为“林可批评”。后来就有人揭发他炮打林彪。好在没写大字报，最后不了了之。

综合观察“12月黑风”，可以看到：

1.从伊林、涤西大字报到北师大刘中柱等人的大字报，语言极其温和，内容都是摆事实、讲道理，向林彪和“中央文革”提意见、谈建议。体现的是忧国忧民，是赤子之心。但是却因言获罪，被打成“反革命”，饱尝了牢狱之灾。宪法上明确规定：公民有言论自由，等等。法律被粗暴践踏。公理何在？

2.这些大字报在当时已经涉及反对“个人崇拜”，要民主、要言论自由，提出了民众可以罢免官吏，等等，这些问题在50年后的今天仍是禁区，可见他们的政治眼光远大。

3.他们贴大字报的时间是1966年年底，对像是林彪、“中央文革”。风险之大人人皆知。但他们有“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英雄气概，令人敬佩！

4.他们还有一个特点是有担当，即使身陷囹圄仍然尽可能保护他人，所以像李观韶、孙光启、陈木法等都没受牵连，真是难能可贵。

三、拘留所

约在1966年12月中旬，江青接见首都红卫兵时说：现在有一股黑风（即十二月黑风），有一小撮反动分子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炮打林副统帅。指出要揪出这股黑风的黑后台。12月18日，谭厚兰的手下先将刘中柱、杨以鸿、敦进田、张传亨四人押送到公安部（天安门广场历史博物馆东），旋即再押送到半步桥（陶然亭西自新路）的北京市看守所。很快，李文博与李世取也被抓进北京市看守所。12月22日是李世取的生日，他的21周岁的生日是在拘留所内度过的。

据刘中柱回忆：

12月18日夜，我们四个人被送到北京市看守所。当时我正发烧，晕乎乎地别人叫干什么就干什么。干了些什么都记不清了。大概分别登记了姓名，将兜里的所有东西拿出来，由警察登记保管。然后给一床被子，两个盆子一双筷子，送到一间拘留室。第一夜室内只有我一个人，因为太累了，我裹着被子就睡着了。也不知道杨以鸿他们被送到什么地方。第二天早上，看守敲门叫醒，各室依次洗漱，从门上小窗，才看到杨以鸿、敦进田和张传亭关在同一巷子不同室。敦进田在邻室，杨以鸿和张传亭在对面。早饭后，两个警察依次进各室，向我们宣布，根据北京市公安局局长谢富治的命令，拘留我们，并要我们在拘留证上签字。我拒绝签字。大概这是他们意料中的态度，二话没说，他们收起拘留证转身就离开拘留室，并“咔嚓”锁上门。拘留的生活正式开始了。

拘留室的号子，面积约为 3×3 平方米。门向走廊。门上一窗户，一尺见方，从外面挂一白布。看守掀开白布，可观测室内的被拘留人员。门对面墙下由约一寸厚的木板拼接，从左墙到右墙成一整张床，类似于日本人喜欢的榻榻米，离地约20厘米。被拘留人员坐、睡均在床上。铁打的营盘，流水的犯人，床板已被磨得光可鉴人。床上一小炕桌，供犯人写材料。门对面墙上有一宽一米，高60厘米的窗户，窗子朝外开，窗户上有铁棍的栅栏。我站在床上可以看到外面的一部分地方。屋顶中央有一盏电灯，灯泡为铁丝网包围，防止犯人卸下来。大概拘留所也是头一回遇到关进来如此多的学生，也搞不明白按什么规则来管理这些学生，只好采用“大概差不多”的办法。按拘留所规矩，被拘留人员在室内平时应端坐在床上反省。我们则不管那一套，想躺就躺，想坐就坐，看守们也不管。我们常常掀开门上窗户的布帘子，伸头到走廊，和其他室的难友聊天。多的时候，每个号子的门上伸出一个脑袋，整个走廊上像开会一样。有时候看守觉得太过分，吆喝一声，大家缩回头去。不一会，头又陆续伸了出来。一直到1967年一月风暴，政法公社夺了权，管理才逐渐紧起来。拘留所将布帘撤去，换成缩拉门。门外面有一小拉手，看守可以从外面拉开小门以观察室内。但室内人员仍然从里面拨开门，将头伸出去。管理人员最后只好在门上钉上钉子，让缩拉门只能打开三四厘米宽的一条缝，这才杜绝各室间伸出头的聊天。

拘留所内的伙食标准刚开始为月11·5元，粮食日九两。早上一个窝头、一碗玉米面粥，一点咸菜，中午两个窝头，一碗煮白菜，里面几个豆渣兼豆腐丸子，晚餐一个窝头一碗白菜汤。一个星期有两次在中餐的菜中有几片肥肉。知识分子讲面子，头一两天都还装作无所谓，在走廊聊天的时候都不提伙食。几天后到底熬不住，叫嚷下一顿饭快来。在1967年1月13日《公安六条》公布后，伙食标准下降，改三餐为两餐，每天“八两窝窝头”。这个低标准的伙食让李世取得了慢性胃炎，后来此病一直折磨着他，2015年3月27日还发生了胃穿孔，不得已做了胃部手术。

宣布被拘留以后，好几天都没人理。只见不断有学生被送入。开始是我们贴林彪的大字报的学生，包括北大学生，北京农大附中的伊林、淦西，北航学生，北大的学生。然后是贴周总理的大字报的学生，贴“中央文革”的大字报的学生。后来是西城纠察队、东城纠察队、海淀纠察队的中学生，工人纠察队的工人。后来进来了赫赫有名的谭力夫。实在搞不清为什么要将他也抓进来，大概根据“政治就是平衡的艺术”吧。以后将李井泉的两个儿子李黎风与李明清抓进来了，他们都住在贺龙家。他们自己就公开说，抓他们是为了榨取对贺龙不利的材料。老大李黎风是清华的，老二李明清是北航的。以后回学校，老二被北航“红旗”打死了。其实将这些人放到一起，可能是一个不明智的决定。这些人不会真正地承认错误。纵然这些人可能在政治上是相互对立的，但对于将他们抓捕这样的处置极为反感。将他们集合以后，产生心理上相互支持的效应，从而制造了一个大大的对立面。几天后，开始第一次审问。我被带到一个审讯室，室内两个警察，主持审问的那位，约五十岁。大概觉得对付我是游刃有余，在这个过程始终保持着微笑。这一次主要询问我们写大字报和贴大字报的情况，问得非常仔细，特别关注是否有后台支持。询问结束以后，让我看了笔录。当我表示无误后，在笔录上按上手印。然后要求我回号子，将整个过程详细写出来。为此，给了我

一些纸和笔。以后这些纸都派上了其他用场，如写菜谱，作象棋围棋，扑克牌，等等。又过七八天，又提审一次。这一次简单问了几个细节后，就聊起天来。显然，所有的情节非常简单，对于这些审案的老手，实在是索然无味，让他们打不起精神。所以像混日子一样，连笔录都没有，一会儿就打发我回号子了。一月风暴后，又提审过一次。这次换人了，有一个愣头青，大概是政法公社的吧。当时，《公安六条》已经颁布，他们尚方宝剑在手，又是革命派，于是指责我们攻击敬爱的林副主席，如何反动。无论说得如何热闹，但始终不说究竟要把我们怎么样，就放我回号子了。后来一想，他们无非是过把瘾，想表现一下他们的存在。从此，就没有人再过问我们。到1967年4月中旬某日，东城纠察队、海淀纠察队的头头们从预审室回来，告诉大家，已经决定放他们回去，只需写一个二百字的检查即可。同时，他们说，预审员告诉他们，这大概是毛主席接见一些（被打垮了的）干部子弟时作出的决定。我们估计离我们出去的时候不远了。当时的基本想法，先出去再说。约两个月后，我们被分别带到预审室，通知我们写二百字的检查。两天后，又被叫到预审室，对我们说：你们被学校送来的（他们忘了曾让我们在拘留证上签名），学校现在接你们回去（将抓我们的责任全部推给学校）。我问，我们算什么？回答，以后不要再出事了（不明不白，让你自己想）。于是，便结束了拘留所的生活，被北京师范大学革命委员会接回学校。这里面一些微妙的环节，革委会的人好像都不太理会，当时他们正在兴头上，根本没有看出这里面的眼高眉低，没看出公安局已经将所有责任都推到他们头上。可能革委会会有个别人已体会到这里还有一点奥妙，但仍然不管不顾地折腾我们。不过当他们覆灭的时候，这些都是小罪恶了。

据李世取介绍，李文博因“罪”重，与伊林、涤西等关在另一号子里。他和敦进田、张传亭、刘中柱、杨以鸿被拘留审查时是关在同一个大号子里的。起初关他的那间在杨以鸿、刘中柱的斜对门。李世取说：我的隔壁先住过谭力夫（他的对联我是反对的，曾与同学一道往北京工业大学找过他，本想与他辩一辩的，可惜他带队下乡支农去了，没想到我们在这个地方成了邻居）。见到的谭力夫实为一白面书生，待人彬彬有礼，其人全无读其“对联”和讲话稿让人感觉到的那股“杀气”。他被移走后，住进去的是李井泉之长子李黎风，不久他也被移走。后来，我被转到1号房与敦进田、张传亭在一室，这间屋上午能见到阳光，较原来那间暖和许多。这里每天接近中午时都能听到有脚镣在地上拖行发出的异响，过一阵又能听到回来的声音。一次我好奇地爬到窗上往外看，看见的是一个带脚镣的人被两个人拖着往外走，被拖的人个子不矮，但很瘦很瘦，闭着眼。这令我很是震惊。不久，听说这人是刘少奇的儿子刘允若，也是被拘留的，因为绝食，但监管者绝不能让其饿死，就每天拖着他到一个医务室那边用管子插到胃里，强行给他进食玉米面粥。真是残酷！

此间负责审查他们的人员对他们还是很讲政策的，没有出现“逼供信”之类的事情。在他们检查了自己的“思想认识”错误，并重点查清了他们“身后”并无“黑手”操纵、支持（没有刘、邓线上“组织”的“黑手”）。查清“有无幕后黑手”，这应该是“拘留审查”他们的主要目的。但是查了几个月，发现这些学生大多数都是平民出身，很多还是“红五类”子女，写大字报都是自发行为，与“刘邓司令部”毫无牵连，跟“联动”绝对是两码事，于是在1967年5月29日上午被解除拘留。

（未完待续）

◇ 附：李文博：公社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了（概要）

“文化大革命”的任务是“斗、批、改”。这里的“改”是指革新社会主义制度，改善无产阶级专政。通过发扬无产阶级大民主，触及人们的灵魂，形成一场大张旗鼓的思想革命。

资产阶级革命已经创造了使地主阶级不能继续存在，也不能产生的条件的一种制度，无产阶级则要创造一个使一切剥削阶级都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一种新制度。

我们现在的制度是从资产阶级那里来的组织形式，是一个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这仍然是产生资产阶级、修正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温床、社会条件。这种组织形式不能再继续下去了。这种领导机构从形式上与旧社会资产阶级专政机器是一样的。这种机构是官僚主义和奴隶主义的温床、社会基础……

由于领导机关仍然沿用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套方式（或者经过了某种改组），因此人们的社会实践是在社会思想下进行的。

要实现巴黎公社的原则。巴黎公社的原则主要有两条：第一，官吏的工资不能超过熟练工人的工资；第二，人民有权随时罢免官吏。总之，人民需要一个廉价的、廉洁的政府。马克思说：公社虽然被搞垮了，但它的原则是永存的。在无产阶级实现公社原则之前，它将一直大喊大叫。文化革命的目的就是要实现巴黎公社的原则。

共产主义航船的桅杆已经露出地平线了，让我们高举双手迎接它吧！

（1966·10·17）

□ 来源：《师劫——北京师范大学文革亲历者文集》。黎云编著，（香港）时代文献出版社，2019年1月

~~~~~

## 【往事非烟】

### 北大文革回忆——7·12大字报

· 吴乃龙 ·

北京大学文化革命中的一个重要事件是1966年7月12日地球物理系陈必陶等5位同学贴出标题为“把运动推向更高阶段”的大字报。一些有关的回忆和评论文章出现在书籍和互联网上。作为陈必陶的同班同学，我也来讲述事情的经过和发表自己的看法。（大字报的原文附在本文后面。）

#### 一，大字报的产生

这5位同学中的4位，陈必陶，赵小康，贺玉芳，袁素云与我同班。本班是地球物理系1964级2班（大气物理专业），共有25名同学，其中男生21人。文化革命中开会是在男生宿舍。由于宿舍空间大小的限制，一般情况下，全班同学分成两个小组，各组占用一个寝室。这4位同学中，后3位属于同一个小组，组长是贺同学。陈必陶则是属于另一个小组。

这5位同学中的最后一位赵玉亭，与我同年级不同班，来自1964级1班（地球物理专业与高空物理专业）。因为每个寝室住宿6人，本班21名男生中的3人（包括陈必陶）与1班的3位同学（包括赵玉亭）合住一个寝室（39楼505室）。因此，陈、赵两位同学彼此很熟悉。7月12日当天，写大字报的那个小组的会场正好在505室。

我与这后3位同班同学不属于同一个小组，7月12日那天不在505室，没有参与大字报的写作，没有在大字报上签名，但是大字报贴出后，我坚决支持这份大字报。

根据袁同学的回忆，7月10日星期天晚上，陈必陶和她一起坐公共汽车离家返校（两人家在北京，是邻居）。路上陈必陶说，周末他的几位在大学读书的朋友和他聊起当时的文化革命，大家都觉得有些压抑感，有些学校里甚至有学生质疑工作组的所作所为仍是老一套。袁同学当时心有同感，但是转念一想，那些人都是高干子弟，天不怕地不怕，说什么话都不要紧，而自己是一介草民，不敢妄议朝政。

第二天7月11日星期一，全班同学照例分成两个小组开会。袁同学的组在505室。依照惯例，开始是读报，大家轮流，每人一段。接着是讨论，每人都得发言。上午完了，下午照样。6·18事件以后，天天如此，有时晚上也要开会。

这天晚上，这组正在505室开会时，赵同学回宿舍拿东西。他推门一看，发现里面正在开会，就连忙退了出去。过了不久，从楼道里传来踢踢踏踏的脚步声和脸盆的磕碰声，这说明就寝时间到了。女同学正准备离开会场，不料陈必陶拉着赵同学开门进来。袁同学听见陈必陶对赵同学说话，重述在星期天晚上返校路上对她说的话，即其他大学的学生对工作组有看法的事。大家一听此事，都来了精神，各抒己见，热烈讨论起来。直到熄灯时间，才各自回自己的宿舍。

7月12日星期二上午，505室。小组会一开始，组长贺同学就说，昨天大家讨论很热烈，都关心国家大事，关心文化大革命。他问大家，是否可以用大字报的形式把大家对当前运动的想法写出来，帮助工作组推动运动深入发展。大家一致同意，把陈必陶从另一个小组请了过来，一起起草大字报。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很快就把大字报写出来了。在场的同学中有5位签上了自己的名字。然后，一起去把大字报贴到宿舍楼（39楼）北面的学生第六食堂的西头的墙上（朝西）。

## 二，大字报贴出之后

7月12日大字报贴出后，引起不少同学围观和议论。特别是午饭和晚饭时间，不少同学端着饭盆边吃边看大字报。围观的人越来越多，在原大字报（约2500字，大概有6、7张纸）周围贴了不少大字报，有支持的，有反对的。

本班、本年级和本系的同学立即分成支持和反对的两派。支持的同学认为大字报说的情况是事实，不认为大字报是反对工作组的。反对的人则认为，大字报是反对工作组的。在大字报贴出的几天内，工作组没有公开表态。当然，大字报的作者和支持者是承受着压力的。

大字报贴出几天后（记不得准确日期，但是可以肯定，一定是在7月18日之前）的一个晚上，我听到学校广播台的高音喇叭广播，呼叫5位大字报作者的姓名，要他们立即去燕南园XX号。根据袁同学的回忆，她在听到广播呼叫后，心里嘀咕：事儿来了，不知是祸是福，但是心中无愧，也就毫不犹豫去了燕南园。到达后一看，已经有人先到了。除5位同学外，还有一位老师向他们介绍坐在她自己旁边的女士。由于当时头有点晕，袁同学没有听得很清楚，好像是李讷。散会后回想，袁同学觉得应该就是李讷，因为她的眉眼和面部与在大街上贴的毛主席像有些相似，而且讲话的语调和气度也不一般。会很快就开完了。主要是询问7·12大字报产生的前后情况。5位同学一一据实回答，说明就是想表达自己当时的观点。

7月18日晚上，即“6·18事件”一周月之际，校工作组组长张承先在全校广播大会上，很不情愿地宣布，陈必陶等5同学的7·12大字报是“革命大字报”。我还记得当晚的情景。很多人聚集在学六食堂南面、38楼和39楼北面的马路和空地上听挂在一棵大树上的高音喇叭。当说到该大字报时，张承先停顿了几秒钟，才蹦出“革命大字报”这5个字。人群中立即发出一阵掌声。掌声并不响亮，说明原先支持大字报的人并不占多数。

大字报的作者和支持者都松了一口气，原因是，“反对工作组”的帽子没有了，而且被工作组承认为“革命大字报”。请注意，支持大字报的人不是认为，大字报反对工作组而且是反对对了。很多原先反对大字报的同学也转而支持大字报。没有人再说那张大字报是反对工作组的，至少没有人公开说。

7月25日、26日和8月4日三个晚上，中央文革小组和其他中央领导人物在北大东操场召开所谓的“万人大会”。在7月26日的大会上，宣布撤销工作组和成立学校的文化革命委员会。在成立（正式的）文化革命委员会之前，先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筹备委员会，每个系选举一名委员。地球物理系进行了相当激烈的“竞选”。两位候选人是：7·12大字报代表人物陈必陶和老牌学生干部、1960级学生王世一。竞选活动在学六食堂南面、38楼和39楼北面的马路和空地上进行。陈必陶本人没有出面竞选，只是他的一些支持者在热情鼓噪。王世一则亲自出马发表演说，加上她的支持者的呐喊。竞选结果，陈必陶当选为地球物理系的委员。当选后他只去参加过一次校文革筹委会会议。据他自己说，不再去开会的原因是（开这种会）“没意思”。后来在校文革筹备委员会的基础上成立校文革委员会，陈必陶不是地球物理系的委员。

1967年7月12日，由新北大公社16团（地球物理系）组织学校的7·12大字报发表一周年纪念大会。其时以聂元梓为首的新北大公社已经发生分裂。16团被“反聂派”主导。当晚纪念大会在五四操场举行，只有“反聂派”参加。主持大会的是地球物理系1962级学生王素菊。我在大会上代表本班（陈必陶所在的班）发言。陈必陶本人也在大会上作了简短发言。

### 三，讨论

#### （一）7·12大字报的性质

1966年5月25日下午聂元梓等7人的大字报在大饭厅东墙贴出后，引发了支持者和反对者的辩论，但是没有影响到学校的教学秩序，第二天我们照常上课。6月1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这份大字报。第二天开始，学校停课。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随即进校，领导北大的文化革命，斗“黑帮”，包括开斗争会和强迫劳动。工作组也把学生分成“左、中、右”，准备整学生。6月18日，部分学生甩开工作组，“自发”斗“黑帮”。工作组把它定性为6·18反革命事件，运动从而进入冷清时期，引起一些同学的不满。这就是7·12大字报产生的背景。

张承先在他的文章“文革初期的北大工作组”〔1〕中说，在陈必陶等五名同学贴出大字报后，“工作组领导小组决定通过这张大字报，进一步贯彻‘放’的方针，把运动搞活。”仿佛他对大字报的态度是一贯肯定的。根据其他同学和我的回忆，张承先说的不是事实。

根据北大学生陈焕仁的日记〔2〕，7月17日他到大饭厅听了张承先的报告。报告的题目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把运动推向更高阶段”。报告的内容是：“首先总结了前

段运动，然后布置了今后的工作，点名批判了陈必陶等5人大字报，他用了很长时间，对陈必陶大字报罗列的工作组‘五大罪状’，一一地予以批驳，说陈必陶等人的大字报完全是别有用心，北大的运动只能在工作组的领导之下，坚定不移地按照中央部署和要求进行，决不能让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去左右，从而走偏方向。”

我不记得张承先作过这样一个报告（可能这个报告根本就不是面向我们这样的普通群众）。但是我记得我们都承受着很大的压力。正如北大学生古樟的看法〔3〕，张承先态度发生过转变；这个转变是北京市委领导李雪峰和吴德一再做工作（批评）的结果。

总之，工作组（即组长张承先）对大字报的态度不是一贯不变的。由于上级（北京市委）的压力，由（自主的）否定变成（不自愿的）肯定。

让我们来看大字报的内容，根据当时流行的方法解读。大字报首先肯定工作组，说工作组领导北大文化大革命取得很大成绩。然后，以地球物理系为例，列举运动中存在的四个问题，其间没有提到过工作组。接着，大字报提出进一步搞运动的两条建议，其间提到了工作组，给工作组出主意。最后表示，要在工作组的领导下，把运动推向更高的阶段。

以上是心怀好意，正面解读，得出大字报不是反对工作组的结论。对大字报也可以心怀恶意，负面解读，得出大字报是反对工作组的结论。大字报在开头对工作组抽象肯定，然后对工作组具体否定。大字报列举运动中存在的四个问题。虽然没有提到过工作组，但是运动是在工作组领导下进行的，所以，工作组必须负责，也就是说，这四个问题是由于工作组的错误造成的。大字报提出进一步搞运动的两条建议，趁机攻击工作组“包办代替”，“怕‘乱子’”。最后谎称“要在工作组的领导下，把运动推向更高的阶段”，其实就是要抛开工作组，由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去左右运动，偏离大方向。

没有亲历文革的人很难欣赏当时那种能从鸡蛋里挑出鸡骨头，甚至挑出猪骨头的本事。

依我的看法，7·12大字报不是反对工作组的大字报，顶多能算是对工作组不满的大字报；是工作组把它说成是“反对工作组”的大字报，从而可以给作者和支持者扣上“反工作组”这顶大帽子。须知，工作组自称是党中央、毛主席派来的。因此，“反工作组”就是“反党”。这种“反×××”就是“反党”的逻辑，一直通行无阻。文革开始后，这是北大第一次出现的这类大字报。因此，工作组必须把它打压下去，才能维护工作组的权威。这顶帽子很好使。

在工作组一统天下的文革初期，写出和贴出这样的对工作组不满的大字报，签上自己的名字，需要很大的勇气。从前面的第一节“大字报的产生”可以看到，是陈必陶把对运动现状不满的情绪和看法带到在505开会的小组。第二天，是组长贺同学提议写大字报，帮助工作组推动运动深入发展，得到大家的同意。在写大字报过程中，陈必陶起了关键作用，在大字报上第一个签名。根据全班分组方法推断，在场应有10几人，但最后只有5人签名。这说明过半的人不同意或部分不同意大字报的内容，或只是勇气不够。

有意思的是，在工作组表态之前，大字报的作者和支持者都辩称，大字报不是反对工作组的；大字报反对者则说大字报是反对工作组的。在工作组表态、说大字报是革命大字报之后，作者和支持者的说法不变，而反对者则改变说法。总之，大家都说大字报不是反对工作组的。后来，工作组撤出学校，大家批判工作组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都转而说那是北大第一张反工作组的大字报。这不是有点滑稽可笑吗？

## （二）7·12大字报对北大文革的影响

（1）7·12大字报贴出后，校园里出现不少支持或反对的大字报，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6·18事件后的冷清局面。但是，局面在短期（一周）内会发生根本性的转变，迫使工作组承认7·12大字报是革命大字报，是因为外力迅速介入的作用。从表面上看，是北京市委（李雪峰、吴德）对张承先的批评。实际上，是更高层的力量在起作用。从逻辑上讲，文革初期的工作组（以及后期的工宣队），是共产党中央派的。因此，工作组的老虎屁股别人摸不得，只有党中央才能摸。只有党中央才能说工作组犯了“路线错误”，才能命令他们撤出学校。说工作组是刘少奇派的，不是党中央派的，那是狡辩。难道刘少奇是以个人名义而不是以党中央名义派工作组到学校？何况，有人披露，向北大等单位派工作组是得到毛泽东同意的。更可笑的是，在清算工作组的错误时，说工作组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共产党中央派的工作组执行的路线，与资产阶级有什么关系？说工作组执行了“无产阶级反动路线”，还靠谱一些。

从事情发展的时间顺序，可以看出外力介入的迅速和巨大作用。7月12日大字报贴出，几天后李讷在燕南园会见大字报作者，7月18日张承先在广播大会上宣布7·12大字报为革命大字报，7月25日中央文革小组和其他中央领导人物在东操场召开“万人大会”，7月26日的大会上宣布撤销工作组和成立学校的文化革命委员会。前后只有两周的时间。有理由认为，要以工作组的问题为借口向异己发难，是毛泽东早就计谋好的。7·12大字报的出现，提供了一个契机，由中央文革小组出面，启动批判工作组、撤销工作组、清算异己的过程。

（2）当时流行北大文革“先天不足”论，即：把工作组撤走后、北大文革的情况和清华相比较，北大文革不像清华那样轰轰烈烈，是因为北大文革“先天不足”。根据当时流行的说法，“先天不足”的原因有二。

“先天不足”的第一个原因是：北大有个聂元梓。在工作组撤出后，1966年7月28日成立校文革筹委会，主任是聂元梓。9月11日成立（正式的）校文革委员会，主任还是聂元梓。由于聂元梓是毛泽东钦定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作者，在北大无人可以挑战她的地位，无人可以代替她，因而北大“乱”不起来。而只有“乱”，才能“轰轰烈烈”。10月6日物理系学生路远、周闯在学六食堂东头墙上贴出大字报，标题为“搬开聂元梓，北大才能乱”，劝聂元梓自动退位。

“先天不足”的第二个原因是：7·12大字报的问题解决得过快，前后只有一个星期的时间。时间不够长，打压烈度不够，反抗烈度不够，因而北大没有出现清华蒯大富式人物。不过，这里含有猜测成分。如果工作组来得及对7·12大字报作者和支持者进行猛烈打压，谁也不能预料其结果。

参考文献：

（1）张承先，《文革初期的北大工作组》，《百年潮》，1998年第5期。

（2）陈焕仁，《红卫兵日记》，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6年。

（3）古樟，浅析张承先的《文革初期的北大工作组》，电子杂志《记忆》，第147期。

◇ 附录：1966年7月12日北大地球物理系陈必陶等5位同学的大字报，“把运动推向更高阶段”。（引自“地方文革史交流网”。）

## ▲ 把运动推向更高阶段！

自从六月一日党中央和毛主席派来了工作组，我校起了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即刻在我校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了，取得了很大成绩。革命形势大好，我系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也和全校一样，发展很快，取得了巨大成绩。但运动的发展是有些问题的，尤其当前我们觉得问题比较突出。

### 一、我们对当前的运动有以下几点估计与意见：

（一）运动在当前发展较慢，几乎停止不前，斗苏士文的辩论会进展极慢，原计划搞两天的干部路线问题，结果搞了四天，收效不大。苏士文没有承认任何实质性问题，而是气焰嚣张，至今还负隅顽抗。敌人是不打不倒的。但为什么苏士文这个顽固分子，我们打了还不倒呢？是因为我们打的不狠，现在大字报质量不高，有许多更深层的材料还没有揭出来，大字报几乎千篇一律，大同小异，没有对立面，而是一边倒，难道大家的看法都如此一致吗？

（二）陶铸同志说：“我建议大家串连，班与班串连，系与系串连，甚至可以到校外去，群众运动么，就是要运，就是要动，既不运也不动。几个人蹲在屋子里，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是不行的。”现在我们就是既不运也不动。每天早晨七点三十分至十一点三十分是坐在宿舍里，下午二点三十分至四点三十分是坐在宿舍里，晚上还是坐在宿舍里，几乎没有什么串连，班与班，年级与年级，系与系，学校与学校互不通气，甚至同层楼的也是“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整天在宿舍里，东拉西扯，没有讨论出什么东西。交流经验，交流观点是太少太少了，也没有时间。早晚七点三十分、下午二点三十分到宿舍的规定，很多同学感到卡得死死的，憋得慌，满腔热情，一身干劲不能充分发挥。

（三）现在左中右还不分明，糊糊涂涂一锅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每个人都要在运动中受到考验，可现在大家几乎都是左派，按理说真正的左派是少数，然而学生中你是左派，我也是左派，中间派在哪里？右派在哪里？这真是奇怪，当然真正的左派在哪儿也就不清楚了。

（四）现在各班的核心小组是核心吗？毛主席说：“凡属团结一致，联系群众的领导骨干，必须是从群众斗争中逐渐形成，而不是脱离群众斗争所能形成的。”又说：“一个百人的学校，如果没有一个从教员中职员中学生中按照实际形成的（不是勉强凑集的）最积极、最正派、最机敏的几个人乃至十几个人的领导骨干，这个学校就一定办不好。”当群众还有种种习惯势力和框框的时候，所选出来的人就不一定能代表真正的革命力量。领导核心应是左派组成的。正如主席所说的是在群众斗争中形成的而不是勉强凑集的，不是一成不变的，左派队伍也会分化，真假左派要靠斗争来检验，必须不断地提拔在斗争中产生的积极分子来替换原来骨干中相形见绌分子或腐化了的分子。

现在核心小组还未充分发挥作用，有些干部每天开会太多，脱离群众，核心小组是上头有什么布置就往下传，下头有什么情况就向上反映，一件事作完就要指示，不来就等，没有一点主动性，创造性。说难听点只起传声筒的作用。

### 二、运动在当前怎样搞，我们认为：

（一）要组织起来真正的左派队伍



上面说过在学生中几乎都是左派，实际上左派队伍还没有真正组织起来，我们建议，真正的左派，要打破班与班的界限，打破级与级的界限，我们大家组织起来，组成革命的核心队伍，团结广大革命师生，向黑帮开火，向资产阶级权威开火。

在教师中，我们认为情况更为严重！领导权是否在真正的左派手中？在斗争苏士文的辩论会上，什么人控制着会场？是什么人总发言，什么人不发言？犯了错误的干部洗手洗澡，轻装上阵了吗？为什么苏士文不倒吗？这难道和我们的“队伍”无关吗？红旗杂志社论《信任群众，依靠群众》中说：“掌握了毛泽东思想的广大人民群众，对牛鬼蛇神战斗得最好，他们瞄得最准，打得最狠。”而我们怎么斗得不够好呢？这个问题值得考虑。我们认为，现在的问题首先不是什么知情不知情的问题，而是敢不敢彻底革命的问题。

## （二）要放手发动群众

我们认为，工作组要放手发动群众。就学生来说，广大革命师生蕴藏着极大的革命积极性，不要卡得太死，不要搞清规戒律，要让群众的积极性充分发挥出来。

红旗杂志社论《信任群众，依靠群众》中说到：“我们党必须依靠各个地方，各个部门的坚定的革命左派。不要受级别、资历、年龄等错误框框的束缚，把坚定的左派组织起来，作为运动的骨干，大胆放手地让他们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发挥带头作用。”

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说：“必须善于使用干部。领导者的责任，归结起来，主要地是出主意，用干部两件事。一切计划、决议、命令、指示等等，都属于‘出主意’一类。使这一切主意见之实行，必须团结干部，推动他们去做，属于‘用干部’一类。”毛主席又说：“必须善于爱护干部，爱护的办法：第一，指导他们，这就是让他们放手工作，使他们敢于负责；同时适时地给予指示，使他们能在党的政治路线下，发挥其创造性……。”

我们的工作组，就要“大胆放手”，让坚定地发挥带头作用。我们坚决服从党的领导，服从工作组的领导。但领导不是包办代替。我们服从工作组领导是要让我们放手工作，同时又适时地给予指示，使我们能在党的政治路线下发挥创造性。

我们希望，工作组不要怕“乱子”，搞运动吗，就得“乱”点，不“乱”才不是“正轨”。现在就有点松松散散，稀稀拉拉。比如有的人，游泳、打球，一玩就是一二小时，有的人一天游泳竟达二、三次之多，有的人读小说，科技书，爱不释手，试问这兴趣哪来的？他们一搞运动就象泄了气的皮球。我们提倡适当锻炼身体。问题是有的人竟达到了疯狂地步，这和对运动的态度形成鲜明对照。在这里就反映着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

要搞运动就不要怕乱，不搞运动当然也就不“乱”。要在乱中求不乱，有点“乱子”才好呢，这样每个人都要接受检验，人们就会分化，各派队伍就会分明起来。左、中、右分明了，我们看，这就比“一锅粥”好搞。“六·一八”不是许多牛鬼蛇神登台表演了吗？一表演就暴露这岂不是好事。

以上就是我们对当前运动的看法，同志们可以充分发表意见，进行辩论，在工作组的领导下，把运动推向更高的阶段！

地球物理系二年级 陈必陶 赵小康 贺玉芳 袁素云 赵玉亭

一九六六年七月十二日

□ 原载《华夏快递》二〇一九年三月廿四日

~~~~~

【乱世人生】

我跟“反革命”父亲“划清政治界限”

• 冯印谱 •

“文革”伊始，我正在本村学校读小学，父亲被戴上一顶“历史反革命分子”帽子，被从大队卫生所赶回生产队劳动改造。

此前，因为有一个会看病的父亲，因为有一个贤惠又能干的母亲，因为有一个高中毕业当民办教师的姐姐，因为我的学习成绩十分优秀，因为我们家人口少日子过得比较殷实，在同学、老师、村民们眼中，我是一个人见人夸的“宠儿”：

“那是冯医生的儿子，长得多帅气！”

“冯医生教育的孩子，聪明伶俐，又懂事理。”

“这孩子将来长大肯定有出息！”

.....

然而，转瞬间，笼罩在我身上的所有光环统统消失了，我成了一个“历史反革命分子”的儿子，一个“黑五类子女”，一个“狗崽子”。立刻，有的老师不待见了，有的同学不理睬了，村民们看见我，好像没看见似的。

一度时期，一伙同伴联合起来欺负我。我上地给猪羊割草，常常孤单一人寻不到伴儿。在山沟里，有的孩子老远瞧见我，常常故意讥讽我，嘲笑我，辱骂我，扔土坷垃砸我。

有时与同学、同伴争吵起来，他们就骂我“狗崽子”“反革命分子的儿子”。我听了很觉刺耳，很感委屈，很不服气，理直气壮跟他们争辩，说我父亲是好人，他们便合起伙来揍我。我被迫“自卫还击”，但身小体弱，常常寡不敌众，被他们打得鼻青脸肿。

一路心酸，哭鼻子回到家，我故意撒谎，竭力遮掩，不敢也不愿让父母知道真相，不愿让他们看见我受伤。偶尔被父母发现了，他们一边给我的伤口涂抹药水，一边摇头叹息，伤心落泪。

尽管在如此境遇下，我并没有消沉，没有灰心，没有破罐子破摔。学校老师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对我们这些黑五类子女有个说法，叫做“出身不由己，道路在选择”。

当时社会上广为流传一则周恩来总理的故事。说是有一次周总理会见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赫鲁晓夫盛气凌人地说：我出身工人阶级家庭，而你却出身官僚资本家庭。周总理含笑点点头，机智地回答：“是的，赫鲁晓夫同志，你说对了，不过，我们都背叛了自己的阶级！”背叛家庭，投身革命，周恩来等老一辈做出了表率，我应当向他們学习。

我相信党，相信组织，我要积极要求进步，我要跻身“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行列，我渴望加入红小兵，加入共青团，加入共产党，力争做一名社会主义红色江山接班人。

于是，在申请加入红小兵组织的时候，在申请加入共青团组织的时候，在遇到各种政治运动要求表态的时候，我就需要公开亮明自己的政治态度：跟“历史反革命分子”的父亲“划清政治界限”。这种表态，有时说在嘴上，有时写在纸上。而且，关键是要落实到行动上，让老师、让同学们、让组织看到，赢得他们的认可和赞许。

我们村学校组建了一支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我积极报名参加，星期天也不休息，勤学苦练，最终成为宣传队的主要演员。学校组织各种校外劳动，比如捡麦穗、翻地、挖渠、给孤山顶上挖泉工地背砖，我虽然身小体弱，但在劳动中咬紧牙关，特别能吃苦，不怕脏，不怕累。每次劳动结束班主任老师总结时表扬到我，心里特别高兴。在校园挖地道劳动中，我被班级同学评选为“劳动模范”，在全校大会上受到表彰。

但是，尽管我努力争取，付出了许多，上小学轮到加入红小兵，没我的份；上初中轮到发展共青团员，没我的份；初中毕业轮到推荐上高中，没我的份；高中毕业回乡轮到当民办教师，更没我的份……对此，我不敢向组织询问：这是为什么？只好拐弯抹角打探，得到的答复总是那么一句话：还需要个人努力表现，要经得起组织的长期考验！

每当我在会上明确表态：要跟父亲划清政治界限；每当我在纸上明确写道：要跟父亲划清政治界限。其实，最初，连我自己也闹不清楚，怎样做才算“划清政治界限”？怎样做才能“政治上划清界限”？划清政治界限，是不是不称呼父亲为父亲了？哪我称呼他什么？是不是不跟父亲在一个家庭生活了？哪我去哪里生活？

后来渐渐弄明白，划清政治界限，就是在政治上跟父亲彻底决裂，在父与子中间划出一条明显的界线：他是我，我是我；父亲是父亲，儿子是儿子；父亲是一个历史反革命分子，儿子是一个追求革命的青少年；父亲曾经与人民为敌，反党反人民，儿子要拥护共产党，做人民的好儿子；父亲是一个接受政府劳动改造的阶级敌人，儿子是一个红色江山的未来接班人。

为了在老师、同学面前表现自己与父亲划清政治界限，每当父亲在学校做义务活，比如清扫厕所。他干他的活，我读我的书，即便当面碰见父亲，也像没瞧见一样，绝然不会主动上前打一声招呼，问候一声，喊他一声“爸爸”。

学校宣传队在村里戏台演出，父亲被大队治保股干部支派在戏台后场烧火炉、打水、看护戏台、做杂务。在现场，我会接过父亲递过的一杯热水，我化装、卸妆会找父亲要一盆温水，我会接过父亲递过来的服装道具。如此面对面接触，甚至个别宣传队员还会冲父亲喊一声“叔叔”或“伯伯”，我绝然不吭一声，似乎面前的父亲完全是一个陌生人。

好多次，学校宣传队应邀上公社、县城表演节目，如欢庆“九大”召开。父亲受派跟随宣传队做看管服装道具等服务。午间休息，每个人啃吃自带的干粮，我和队员、老师热热闹闹围坐在一起，父亲和另一个黑五类分子知趣地呆在远处角落。我没有勇气走到父亲身边，关切地问候一声，那怕给他递上一杯开水。

我之所以这样做，全在无声地表明：我跟“反革命分子”父亲划清了政治界限。

然而，回到家里，看见父亲每天下地劳动归来疲惫的身影，看见父亲半夜三更被喊去做义务活，看见父亲沉默寡言一袋又一袋抽旱烟的样子，我深深地为父亲感到难过，感到可怜，感到可悲。他独自承受着肉体和精神上的双重负荷。肉体上，他由不会干农活的医生演

变成一个啥农活也会干也得干的农民；精神上，他需要干那些扫大街、扫厕所等众目睽睽下丢尽颜面的义务活。

与此同时，在生产队“大锅饭”缺粮少钱的情况下，父亲还需要设法挣钱来支撑这个家，他是这个家的顶梁柱，倘若这根顶梁柱倾斜了，歪倒了，这个家也就垮塌了。我相信，在内心深处，父亲无疑进行过无数次激烈的煎熬和斗争。

母亲悄悄叮嘱我：娃，尽量少惹你爸生气，为了你们，你爸多次有轻生的念头。最终，父亲以沉默面对着羞辱，以忍耐战胜了痛苦，以煎熬期盼着未来，坚强地踏破坎坷，盼到了1979年摘帽子的那一天。

听了母亲的话，我禁不住在内心谴责自己，我在学校与父亲划清界限的所作所为，父亲知晓不知晓呢？假如他知晓了，他会怎么想，他会伤心吗？他会痛苦吗？他会自责吗？我这样做，对得起百般疼爱我的父亲吗？

在矛盾与痛苦的交织中，我尽力帮助父亲做点事，给自己心灵一丝慰藉。别看父亲看病开药方从容潇洒，但他小时候没上过几天学，文化水平较低，甚至连一封家信也写不来。那年月，管制“黑五类分子”的大队治保股干部，常常在下雨天或夜晚，把这伙人召集到大队部，进行政治学习，改造思想。学习主要是念毛主席著作，念报纸。每次学习结束，还要求每人交一份思想汇报。

父亲的思想汇报起初由姐姐帮他写，后来就主要靠我了。写着写着，渐渐地，我也摸到了写这种思想汇报的套路。第一部分写今天学习了什么内容，阐述其内容的重要性和现实意义；第二部分将学习内容跟自己过去所犯的罪行联系起来进行批判，特别要把自己的过去臭骂一顿；第三部分则要感谢党和政府的不杀之恩，感谢党和政府给自己生活的出路，给自己饭吃，给自己劳动改造、重新做人的机会，要写出感激涕零、痛改前非的深度来。

像这样的思想汇报递交上去，我想治保股干部不会一份份仔细看，因为那时候大凡农村的正派人，是不屑于干治保工作的。治保股干部经常率领一帮人，以巡夜、护青为名，干着抄家、抓人、打人的勾当。他不会看每个黑五类分子递交的思想汇报，更不会一份份仔细看完，顶多溜上一眼，数一数谁没有交上来，谁的汇报文字写得长就判定是写得好的。当他每次看到递交上来的一摞思想汇报，是不是会产生一种大权在握、居高临上的优越感来？

可怜的父亲心里最清楚，他头上的这顶帽子给家庭和子女带来多么大的影响。他每天谨小慎微地活着，尽心尽力做许多力所能及的事情，似乎在一点一滴弥补过错，不，是在赎罪。我参加学校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母亲给我缝制了黄上衣蓝裤子的演出服装，父亲特意跑十多里赶集，买回一条价格不菲的武装带，供我表演时使用。我登台表演节目出尽风头，父母亲打心里为我骄傲！

我在本村初中毕业后，上高中实行贫下中农推荐制度，全班50多名学生，公社只给了四五个名额。父亲打探到，大队推荐委员会由大队党支部、革委会干部和12个生产队贫协组长组成。他不敢找大队干部，厚着脸皮找过几个此前关系处得不错、能说上话的贫协组长，央求他们帮帮忙，能在会上推荐我上高中。拜见贫协组长时，父亲没忘送上一捆自己留地栽种的旱烟叶，聊表心意。

还真不错，据说在推荐会上，确有几位贫协组长提到我的名字，说我的毕业考试成绩名列前茅，把这样的好学生推荐上去，能给咱们村里增光。但是，此言一出，当场就被“极

左”的干部否决了：就这几个名额，咱们贫下中农子女都不能全部上，哪能轮到黑五类子女？没能被推荐上高中，我痛苦，父亲更伤心。他老人家重男轻女思想严重，感觉女儿读完了高中，儿子因为自己的一顶“帽子”读不成高中，心痛！

这样的父亲，我咋跟他划清政治界限？

我没能被推荐上高中，心灰意冷回乡参加劳动。这无疑会给家里挣工分，减轻父亲的负担，还可以帮父亲干许多家务活。可是，父亲见我身小体弱，担心经受不起生产队的艰苦劳动，苦口婆心，劝我再复读，等待上高中的机会。我不同意，父亲说：娃，即便复读一年后上不了高中，年长一岁，再参加劳动，身体也会结实点。我没能拗过父亲，重回本村学校复读。

这样的父亲，我咋跟他划清政治界限？

1973年，凭借邓小平二次出山“智育回潮”的机遇，我远赴姐夫姐姐工作的阳曲县泥屯镇考上了高中，因路途遥远花销太大，就转学回到家乡的阎景中学。由于两地春季和夏季招生的错位，我的学业跟不上，希望留一级，跟随下一届学生扎扎实实学点知识。那时候学校秩序比较混乱，压根没有留级这一说。父亲找到学校一位领导央求，该领导回答，现在学生都在混哩，你孩子留级做啥？我们保证给你孩子发一张毕业证。

父亲无奈，又想尽办法找到当年的一位医疗界同事，这位同事跟万荣县教育局局长杨刚关系不错。杨局长给该校领导写了一封信，父亲拿着这封信，星期天冒着酷暑骑自行车找到校领导在农村的家，校领导看信后，这才同意我留级，跟随下一届同学从头学起。

这样的父亲，我咋跟他划清政治界限？

看着父亲为儿子的成长费心劳神，不辞辛苦，想到自己却要与父亲“划清政治界限”，我心里像打翻了的五味瓶子，真不是滋味。

我“留级”后，再一次满怀热忱向团组织递交了申请书，每次都会附上要跟父亲划清政治界限的表态。可是，过了一个学期又一个学期，仍然没有音信。有次班级团支部讨论我的入团问题，团员们在肯定我成绩的同时，提出了三点不足：一是有点自命清高；二是不爱搭理女同学；三是不积极参加体育锻炼。其实我并不清高，只有自卑。

有一天下午，我因感冒独自在宿舍休息，同学们在教室开班会。会后，史建群同学悄悄告诉我，刚才班主任贾华老师讲话，提到你虽然不是共青团员，但根据你的各方面表现，已经完全符合一个共青团员的标准了。终于望见跨入团组织门槛的曙光了，我激动得一夜失眠。

那时，我们农村孩子读高中，将生产队分的全年口粮交到粮站，国家给每个学生每月补足32斤粮食。但在学校食堂上灶，吃的多为玉米面高粱面，白面稀少，且吃不饱，同学们只好每周回家背馍充饥。

阎景中学校舍占用阎景镇李家大地主的庄园（现已改建为旅游景点），我们一个班男生居住在一座四合院内。一天，我正在北房宿舍休息，院子里有同学高声喊道：“印谱，印谱，你爸爸来了！”我闻声跑出来，身后几位同学也跟随跑出，北房、东西厢房的同学，有的挤在门口，有的隔窗观望。我心里明白，大家好奇地想看一看，冯印谱“反革命分子”的父亲长啥模样。

我甚感窘迫，面对父亲脱口而出：“爸，你咋来啦？”

赶了三十里路的父亲站在台阶下，说：“我来赶集，你妈新蒸的白面馒头，让我给你捎来。”

“我还有……”从父亲手中接过馒头布袋，我没有让父亲进北房看看我的宿舍，没有让父亲进宿舍歇会儿脚，没有给父亲打一杯开水喝。反而，内心深处，只希望父亲快快离开宿舍，离开班级同学们的视线。

父亲看我的表情，似乎读出了什么，也感觉到了什么。“……那我就走了，集上还摆着旱烟摊，托别人在照看，学校灶伙食差点，家里有馒头，一定要吃饱……”

我点点头，默默送父亲走出宿舍大院，望着他的背影渐渐消失，心里翻滚着苦涩的浪花。

1976年1月，高中毕业前夕，经历了数年（包括初中阶段）的“长期考验”，在贾华老师和入团介绍人冯义荣、冯海泉，以及全班同学帮助下，作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获得阎景中学校团委特批后，我终于成为一名光荣的共青团员。

十年浩劫，有政治的混乱，有经济的崩溃，有生命的凋谢，有文物的毁坏，有道德的沦丧。而最严酷的伤害莫过于人性的泯灭。“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宏论，造成了职工斗争领导，妻子揭发丈夫，儿子痛殴父亲，学生打死老师的一幕幕惨剧。我跟父亲之间虽然没有发展到那种程度，但是在各自心灵深处造成的伤痛，就像密林中两只遭受暗箭射中的豹子，蛰伏在地，默默地用舌头舔舐一次次渗出鲜血的伤口。

勤劳、坎坷一生的父亲1998年患肺癌谢世后，第二年母亲临终前告我，我是他们的养子。

呜呼！每每想起父亲对我无私的爱，心中陡然涌出一种莫名的内疚和负罪感。九泉之下，亲爱的父亲，您能原谅不懂事的儿子吗？

2013年8月草于凌空书屋，2014年11月修改，2019年1月27日再改

□ 原载《新三届》

~~~~~

【亲历者言】

山雨欲来风满楼

• 叶桂桐 •

“文化大革命”已经拉开了序幕。

从1965年底到1966年6月1日前，与北京师范大学直接有关的影响到全国“文化大革命”的事件有两件：

第一件，《红旗》杂志借调北师大学生做资料员。

1965年底，在北京，与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同时，“文化大革命”也开始动作了。中国共产党的中央机关报《红旗》杂志社，从北京师范大学政教系、历史系借调了谭厚兰等五六个高年级学生做专职的资料员，为有关人员撰写大批判文章准备资料。

第二件，1966年2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四年级学生金宏达的文章《对于批评〈海瑞罢官〉的几点异议》，署名时汉人，公开为吴晗辩护。

1966年春天，北京的报刊杂志的主题一是批判《海瑞罢官》，这是根据姚文元定的调子来进行的；二是批判邓拓、吴晗、廖沫沙“三家村反党集团”，《三家村札记》《燕山夜话》是活靶子，这也算是北京方面对姚文元批判文章的响应与批判范围的拓展。正是在这大批判的风浪中，时汉人发表了《对于批评〈海瑞罢官〉的几点异议》文章。文章的主要内容如下：

文学作品的社会效果的形成是复杂的，同作者的创作动机有联系，但不是一回事，不能据效果而定这个或那个动机。学术上的错误不一定都归结为政治上的反动表现。吴晗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能够分清敌我，辨别是非，只是不自觉地学术问题上犯了政治性的错误。现在对吴晗的批评缺乏具体分析，拿不出充足的证据，不能以理服人。

我们只要看看文章的几个小标题，就不难看出其中深藏的玄机：

1. “动机和效果问题被弄得简单化了”； 2. “把政治问题和学术问题绝对化了”； 3. “对吴晗的批评拿不出充足证据”。

时汉人认为姚文元混淆政治问题和思想问题的界限，把思想问题说成是政治问题，公开为吴晗辩护。这是在整个批判风浪中，反对姚文元的文章的最有代表性的文章。文章发表后，传出风声说，彭真非常欣赏这篇文章，说等时汉人毕业后，要把他分配到中共北京市委的机关报《前线》去工作。但后来康生在北师大东操场数万人大会上，公开说时汉人是“右派学生”。

从1965年底到1966年6月1日前，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直接有关的、影响到全校“文化大革命”的事件有两件：

第一件，西北楼画展风波。

1966年4月27日，为了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有一位中文系三年级的同学，在男生宿舍西北楼一进大门一侧的白墙上，粘贴了一张铅笔画。画面的主体是一位年轻的母亲站立在画的中央，她的肩膀上坐着一位小女孩，小女孩的手里握着一束深紫色的玫瑰花，那手臂是伸向天空的。人物身后的背景是天安门，天安门的上空是一群飞翔着的和平鸽，彩色的气球飘荡在空中。天安门的一侧是华表。最为惹人注目的：第一，是那年轻的妈妈的头发是烫过的，是卷曲的长发，正在随风飘荡着；第二，是那女子穿着短袖的衬衣，那衬衣领子的开口比较大，露出了半个胸，那露出的地方戴着丝绳项链，项链上有一个心字形玉石坠；第三，更为惹眼的是那母亲的乳房是那样的突出。

那画是上午上课前贴出来的。

到下午课外活动时间，就有人在画的旁边，贴了一张用废报纸写的大字报，批评这张画，说这张画表现的是资产阶级的审美观念和情调。很快就有人响应。

第二天，又有人贴了好几张大字报，其中有的大字报说这幅画是大毒草。

第三天依然如此。

想不到，到第四天，突然有人说这幅画的立意还是很好的嘛，我们不应该随便上纲上线，乱扣帽子，把人一棍子打死。

这自然迎来了更为强烈的批评。批评的矛头，开始不指向画的作者，而是指向了这位为画辩护的人。很快，楼道里便贴满了大字报。墙壁不够用，就在楼道里拉起了绳子，把大字报挂在绳子上。

这消息传得很快，不久，引来了别的宿舍楼的同学也来看大字报。大字报风波轰动了全校。

.....

又过了些天，一天早晨，所有的大字报一夜之间无影无踪了。

第二件，中文系的“反动学生”。

1965年11月，当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之时，秋叶他们正在密云水库参加引水工程建设。他们在那里一边劳动，一边学习。姚文元的文章一发表，他们马上被通知回校参加政治学习，参加批判运动。这真正是闻风而动。

行动之所以如此迅速，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他们系的总支书记是从北京市委调过来的，是北京市委的耳目；第二，当时在北京的高等院校中，一共有四所院校有中文系：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河北北京师范学院、北京师范学院。北京大学中文系分文学与语言专业，语言专业当时以文献为主，文学专业以纯文学为主，人数也不多，搞批判并不特别内行。河北北京师范学院和北京师范学院是地区招生，学生的入学成绩都不算太高。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则大不一样，学生来自全国各地，入学成绩很高，素质较好，又不分专业，人数又比较多，搞大批判最有战斗力，是北京不可小视的一支有战斗力的队伍。把他们调回来，即使不能按市委的要求搞大批判，但至少便于控制，不至于成为敌对势力。

所以秋叶他们从密云回来之后，一是按北京市委定的调子，学习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二是严格纪律，正常上课，不准外出串联，在校按北京市委的规定和定的调子写大批判文章。

四月初，中文系64（2）班一些同学私下议论，现在虽然说得挺好，批判、读书两不误，但实际上是两头互相牵制，两头空忙，应该停课参加大批判，在游泳中学习游泳，在参加实际的大批判运动中增长才干，提高战斗力。

有一位头脑不太冷静的男生，就把这些议论整理成文字材料，递交给中文系总支书记，希望得到领导的支持。原本是一片好意，但他万万没有想到，事情严重了。总支书记马上把材料递交给北京市委，市委马上命令中文系对这些学生严加注意，认为这些学生中有反动学



生，并有一个具体的名单，让中文系团总支分别派专人加以严格监督。秋叶的思想活跃，自然也在反动学生名单之中。但是他们当时什么都不知道，连他们已经被盯梢了都不知道。

中文系的这些未来的“反动学生”，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成了北京师范大学影响颇大的战斗队“燎原”的骨干。“燎原”的《宣言》是蒲寿章起草的，但后来大部分大字报出于杨树森和叶桂桐的手笔。

〔作者简介：叶桂桐，教授。男，1945年9月生，汉族，山东省莱州市人，1969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

□ 来源：《师劫——北京师范大学文革亲历者文集》。黎云编著，（香港）时代文献出版社，2019年1月

---

|         |             |          |
|---------|-------------|----------|
| 本期编辑：   |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 《CND》总编： |
| 华新民（美国） | 思语（美国）      | 陈天寒（美国）  |

《华夏文摘》网址：<http://www.cnd.org/>，国际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mailto: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mailto:cnd-cm@cnd.org)

---